

# 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变迁及其构象分析<sup>〔\*〕</sup>

孟宪平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阶级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在文化领域中的表现和影响,这种矛盾的外象体现在文化主体、文化客体、文化载体上,其内象是以思想意识为基础的文化控制与反控制,以及社会转型、技术动因、匿名权威和大众消费造成的文化张力。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文化矛盾意象包含着人类社会文化变迁的一般逻辑和资本主义文化的特殊表现。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变化提供了认识人类社会演进规律的新契机,包含着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提出了理解未来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要求。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既要认识到其中的社会主义文化因素,又要确立合适的社会主义文化策略,始终坚持“两个必然”的信念,并在深入认识“两个决不会”基础上积蓄力量,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的优越性。

〔关键词〕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构象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1.11.019

## 一、问题的引入

本论题所说的“构象”是指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内在结构、外部表象和社会意象,是表征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最基本的方面。资本主义社会既有早期“羊吃人”的野蛮行为,也有体现商品平等精神的现代市场行为,这种野蛮与文明交织的形式孕育出具有二重性的资本主义文化。传统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化中,经济形态和文化品位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是丰裕的

物质生活带来的“无尽”愉悦,另一方面是不断消逝的诗意栖居和被现代技术冲淡的文化乡愁中夹杂的现实隐忧。在这个似乎被“文化升平”淹没的社会空间里,资本主义文化似乎走向了“缓和”,其内象、外象和意象都在发生变化。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错位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追求压过了精神追求,造成了严重的畸变,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此观点表示赞同;二是社会道德堕落论,认为资本主义

作者简介:孟宪平,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哲学新论”的阶段性成果。

文化矛盾是社会道德沉沦的必然产物,这也是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赞同的观点;三是技术异化论,认为是技术的畸形使用造成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激化,在社会生活的多方面形成了应激式的张力,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持此观点;四是非理性主义论,认为资本主义文化危机源于基本矛盾引发的生产劳动危机,非理性主义是引起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重要因素,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立场;五是社会断裂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享乐主义所主导的文化范式,导致资本主义文化的断层与信仰的缺失,丹尼尔·贝尔是其中的代表;六是从宗教视角看待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上述方面,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常见解读方式,研究者的立场差别造成截然不同的表述形式。

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形成机制、作用机理、变化动因的探索,一直是哲人心思中难以割舍的情结。“历世历代以来,人类不断发出奇怪的呼声,寻找那不知芳踪何处的‘市民社会’,渴求那无以名之的‘社团’,这个现象其实是飘零失落的一代的吁求。”<sup>[1]</sup>从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和实践看,这一表述不够妥切,但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期待认识资本主义变迁的实质的努力。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一些理论已经失去了原初意义甚至变成了陈词滥调,而一些时代强音又成了社会青睐的对象。一些研究者认为,认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仅仅站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二元对立基础上是不够的,从历史规律看,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维系旧关系的约束力在不断解体,旧日的价值观和社会关系也在随风飘散。资本主义曾经是具有强大革命性的力量,它在将一切解体的同时也在自毁长城,锯掉了自己端坐的树干和树枝,甚至连它发展和生存所寄托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放过。现在,它又在拉动锯子,锯掉自己赖以生存的根基,包括随之而来的社会文化也连根拔起。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

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所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谓的市民自由和进步机关,都侵犯它的阶级统治,并且既威胁它的社会基础,又威胁它的政治上层,因此这些东西就成了‘社会主义的’了。”<sup>[2]</sup>一些研究者认为,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曾经像地志航图一样引领其发展,而今这种指南针功能在减弱。在资本主义行经的路途中,文化景观的色调已经暗淡,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广大民众来说,它在未来走向何方是有不少迷茫的。可以看出,在学人心思的认识和注疏中,有期待通过思想和鸣寻找社会和声的,有通过粉饰事实附会资产阶级政治需要的,由于认识的维度、视角、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提出一些观点和看法,期待同行批评指正。

## 二、外象: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变化的表层轨迹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在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等方面都有表现,其外象体现为“具体可感”的诸多形式,在主体、客体、载体和论题等方面都有其变化表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要素在发生量变和部分质变的同时,也使社会的思想文化带上时代印痕,这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运行的表层轨迹。

(一)以阶级分化为特征的文化矛盾主体的变化轨迹

从产业工人转向数字工人是文化矛盾主体最深刻的变化。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方式有其思想文化理据,但当它在遇到现代技术和理念的挑战时,会以新的思维方式颠覆“正统文化”的合法性基础。文化主体及其行为结果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影响尤其明显,与早期工人阶级一无所有的状况相对应的文化地位,在现代社会里发生了新变化,工人和资本家的文化关系在被技术装点之后,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景观。工人阶级文化水平较低的状况也有了很大改观,具有

一定知识和技术水平的工人阶级,在发生“多层次”变化的同时也伴随着文化的多样化取向,作为社会主体的工人阶级的意识有了新的表现形式。过去,阶级成分的“二元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关联形式,现在,阶级成分的多元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关联形式,“阶级斗争变得简单化”的描述也需要重新审视。过去所讲的“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它借助于民主制度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现在所讲的是不论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或政治方面,都显示出资本主义还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传统社会的二元阶级关系由于新中间阶层、知识分子、小额股民的出现而变化,过去比较“纯合”的工人力量变成多元“混合”的社会力量,资本主义国家与广大群众的关系在文化上也有了新形态,经济革命与文化革命的一体性变为社会的显性现象,甚至在很多方面造成了文化变革超过经济变革的事实,尤其是数字资本与网络技术合谋而形成的文化体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横向和纵向上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多种方向的影响。经济地位的变化以及生活状况的改善,单个的素质提升或者整体的素质提高都使工人阶级的文化地位有了新变化,资本主义的生活观念、生产活动、统治制度也对文化矛盾产生巨大影响。由利益取向决定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因文化矛盾的变化而重新定位和排列,至于哪一个方面占据主要地位,则是由物质利益的获取方式决定的。传统资本主义社会对绝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使得工人劳动成为机器的附属物,为生计而奔波的事实使工具理性成为优先考虑的方面。现代技术基本上解决了物质匮乏的窘境,生活品位和幸福指数成为普遍关心的事项,工人阶级不仅关注生活的获得方式,还关注生活品质的提升方式,其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的“提升”在形式上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意蕴,但社会的价值多元、思想多元、文化多元又给资产阶级整合文化矛盾提出了新挑战。如果从效应方面看,相对优裕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对革命激情起着消解作用,阶级构成变化而造成的

“泛工人阶级化”的状态,给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增添了很多新特点,对正统文化持有异议的社会活动也在一些“自治”组织的推动下延伸其象征意义,甚至资本主义社会中原来的各式各样的“守门人”,在受到多样化的文化困扰时,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接受和理解方式也在变化。现代资产阶级也对文化矛盾持有双重心态:“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sup>[3]</sup> 这些因素影响着文化的运行轨迹,艺术的纯洁性与商业的污浊性进一步显示出资本主义文化的乌托邦内容,工人依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力量,但要在文化工业的污泥浊水中展示他们的革命意志,需要做更艰巨的工作。

(二)以强化思想支配为特征的文化矛盾客体的变化轨迹

文化矛盾客体的变化,在这里主要是指其依存空间从传统国家转到现代国家。统治阶级表达思想文化的方式不完全相同,从骑杂沓中的武力征伐,怀柔靖边中的利益安抚,都夹杂着不同的文化方式,过去传统的注重领土安全的观念,现在变为包括文化安全在内的大安全观念,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在过去,宗教伦理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赤裸裸的工具,而在今天它越来越进入日常生活,而且以隐性的方式起作用,它与世俗文化的矛盾也在以经济、政治为主脉的链条上延伸着。宗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约束作用,是当时文化矛盾的焦点内容,在今天这种作用虽然变得很潜隐,但其影响力却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配合下更为强势。思想支配是资本主义国家维护文化安全和推行文化扩张的手段,在钳制人心、固化思想以及彰显资本主义利益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以强化西方文化认同为目标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遭遇了各种张力,在面对国内外的种种文化矛盾时,捍卫价值边界和文化边界的调门越来越高,他们在极力强调思想文化张力和矛盾的同时,极力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指手画脚。现代技

术在使资本主义统治变得更加精妙的同时,也造就了极端的文化权威和文化霸权,技术本身也作为一种文化力量而充满二重性,过去的强制统治力量使工人阶级在经济和文化上经常感受到自己对立面的存在,而在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方面,现在的统治者不再是挥舞着饥饿之鞭的老板,它似乎成了“理性和真理化身的仙女”。日常文化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也渗透到各个方面,其发展状况成了社会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度,它所提供的社会意境让工人阶级感到亲近而又遥远、真实而又虚幻、深刻而又肤浅。生活层面进行的话语转换模糊了阶级界限,很多消费者从有意识的主体变为无意识的客体,在消费人格的扭曲中改变了人们日常的价值判断,尊严、幸福、人权等因经济追求而成了居于次要地位的内容,这种旧有的道德体系已经无法满足资本主义新变化了,传统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对社会生活秩序的规范力、约束力在下降,过去的政治认同、价值认同和社会认同受到新因素、新思维的挑战,缺乏可靠心理向导的惶惑和追忆“安全有序”年月的思绪,不断地打造出虚拟的归属空间,寻找心理栖息之所和“藏身”之处,是社会主体对文化客体提出的新要求。

(三)以追求文化个性为特征的文化矛盾载体的变化轨迹

文化矛盾载体的变化表现为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承载形式转变为以新社会运动为基础的承载形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sup>[4]</sup>19世纪40年代的文化意象是那个时代的印记,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也是站在两大阶级的对立之上的。到了20世纪,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很难见到了,从内容和形式看,似乎都已经远离了刀光剑影、止息了鼓角争鸣,革命主体、革命力量、革命形势都在变化,游行示威、街头政治、颜色革命也和文化联系起来,甚至关于物质利益的冲突也变得“温文尔雅”了。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这个时期应

该成为工人阶级革命的契机以及社会能量释放的窗口,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人们对日常文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家庭革命、社会革命被冠以文化革命之名,人伦关系、道德关系、社会联系都在技术与人文的观照中运行,一些原本被禁止的文化内容,现在却有了新的说辞。对新生活方式的期待促使人们用异乎传统的眼光看待现实,在普遍渗透着“现代化”“数字化”的空间里,大众文化开始对人们的生活起着更多的主宰作用,过去希望以阶级斗争推动文化变革的思路,让位于通过新社会运动来改变人们的行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讲的“两个决裂”,包含着以工人阶级为载体来解决文化矛盾的思路,而现在工人阶级摆脱旧的“思想藩篱”的愿望可能不亚于19世纪,但他们选择达到目的的方式已经不完全过去的形式了。如果说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和1969年意大利的“热秋运动”是以青年学生标榜的“先锋文化”为主体展开的,那么,后来的新社会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则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其中的文化意义是通过多样化的追求来表达的。文化霸权是资产阶级转移国内文化矛盾的重要手段,也是将文化产品、文化矛盾输出到国外的一种策略与方法。当西方文化产品负载的扩张愿望被推向世界各地时,“借着向世界各地传送的文化形象,借着徒步天涯年轻旅人的亲身接触,借着各国大学生日益密切的联络网络,更重要的,借着广大消费社会时尚流行的强大力量及侪辈压力,青少年文化向世界各地传送,一个国际性的青少年文化于此诞生。”<sup>[5]</sup>资本主义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矛盾也从国内延伸到国外,在很多方面都有文化霸权的影子。

(四)以凸显文化内涵为特征的文化矛盾论题的变化轨迹

从局部观念走向全面展开并深入到社会肌体之中,是当下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深刻变化,资本主义文化论题也开始触及更多的生活内容,

因为人们的视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开阔和宏远。马克思恩格斯在谈论文化问题时所说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状态提出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sup>[6]</sup>这是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思维衍生的负面结果。从“物化意识”到“文化意识”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的新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是以劳动和商品作为起点的,“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sup>[7]</sup>商品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也体现了人对商品的崇拜程度,这是马克思所说的“美学上的假象”。卢卡奇曾用物化意识来解释这些现象,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从生产到制度再到思想的全面物化历程表明,“商品拜物教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sup>[8]</sup>现代技术造成了全面物化的事实,连人际关系也变成了控制人的行为的重要因素,社会关系淹没在物的关系中,原来较为清晰地表现人际关系的自然社会都被物与物的关系遮蔽,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也被打上物质支配的印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景观文化被描绘成具有神性光辉的物事,它用影像编织现实社会并将一种无法抵御的诱惑和无可置辩的力量注入社会,这种隐性霸权表面上没有一点强制性,实际上却是具有强大软实力的控制工具,文化的本质被虚假的景观所掩盖,既体现了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润物无声”,又把文化矛盾引向社会深处。“景观非但在实质上没有丝毫变化,而且成功维系与强化了自身的持存和社会的无机运动,大众的顺从和现实的异化也得以延续。这无疑是一场看不见硝烟和抵抗的永久性鸦片战争。”<sup>[9]</sup>在这样的文化矛盾之中,资本主义的存在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它在更深的层次上履行了资本的文化使命,使资本的意识形态性达到了空前的地步,给人的存在带来更深层更复杂的异化。大众工业、数字

传媒、信息技术分别是景观社会的一个部分或序曲,起着不断将景观社会精致化和生动化的作用。由数字技术支配的社会主体,在时空上实现了文化思维的再造和重塑,工人阶级不在前线却影响着前线,不在现场却影响着现场,而资产阶级也在捍卫霸权的运动中打造着文化神像,用无所不在的文化霸权来抵消工人的革命意识。因此,现代资本主义文化所带有的西方政治霸权特征益发明显,资本主义标榜的“艺术没有国界”“艺术不问政治”的话语也黯然失色,不论是体现个人行为的文化,还是代表资产阶级群体的文化,都与政治勾连起来。

### 三、内象: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变化的深层意识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深层表现首先是文化结构的断裂,过去连续的文化意识被当代资本主义因素搅扰着,使人们的思绪也时断时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中被掺入更多的反抗因素,大众工业和日常生活一反过去的外层影响而进入文化内部,资本主义文化从来没有如此深刻地影响着社会。

#### (一) 社会转型造成的文化结构裂变

随着传统资本主义走向现代资本主义,以社会大众为主体的日常生活引起的文化裂变一直延续着,“帝国和它的全球网络的构造是对各种各样反抗现代权力机器的斗争的、具体而言就是对大众获求解放的欲望所推动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回应。”<sup>[10]</sup>大众文化的“创构性力量”与资本运动形成的“结构性力量”,都以不同的程度进行链式裂变,打破了原来被固化的相对静止状态,文化矛盾也在社会转型中发生蜕变或演绎,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控制在遇到各种现实问题时不得不作出思想文化上的转变。“当帝国的行动有效时,也并不是源于他自身的力量,一是在于对大众反抗帝国的一种反弹,它的力量不是自生的,二是来自于另外一种力量,大众的抵抗优先于帝国的权力。”<sup>[11]</sup>文化包含的反抗精神和创构力量有了新变化,不仅在形式上由无产阶级文化

扩展为大众文化,而且在主体上由行业文化转变成全社会文化,在内涵上使工人阶级力量转化为更广泛的劳动者集体的力量。社会结构的转变中,非物质劳动者构成的群体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主体,这已经不是马克思所界定的工人阶级群体了,而是多维度多层构多样化的劳动者群体。文化的表述方式及话语结构也在变化,在“人民”语境转向“大众”语境的过程中,文化的“单一性”被“多元性”代替,文化内容的“纯洁性”被“混杂性”代替,文化导向的“一致性”被“差异性”代替。“它们重构的主体话语追求的是一种整体化的、总体性的维度,而不是碎片化维度,是对后现代主义差异逻辑的诊治,是用一种集体革命的宏大叙事将后现代的差异逻辑整合起来。”<sup>[12]</sup>过去作为“独一体”而存在的工人基于共同的愿望而行动,现在作为“混合体”而存在的大众基于多样性的追求而行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充满对文化意义的悖论性阐释以及对社会结构的错位性理解,文化矛盾既是社会结构裂变的结果,也包含着对无产阶级文化重整的任务。现代技术提供的生产方式、管理范式给资本主义文化发展注入了新内涵,而资本主义文化的自我革新能力,一旦遇到了现代技术的催化和刺激,也会产生出异乎寻常的扩散能力。在变化的无产阶级群体中,上一代熟悉法则,如今却感到人事苍茫;下一代不谙世情,对眼前的社会只有外部印象,新旧阶层因文化差异形成难以弥合的“思维代沟”,由此引起的文化裂变也难以抹平。

## (二)匿名权威引起的思想支配变化

文化之中蕴含着特殊的力量,包含着显性的或潜在的支配能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被视为实施利润策略的新工具。从理论渊源看,关于这种支配作用的叙事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有表现,马克思在其中第一次谈到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谈到无产阶级一旦掌握了哲学这一精神武器,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文化矛盾在社会进程中既有依附性又有独立性,既与物质力量相联系又不是物质力量的

纯粹的附属品,其中积蓄和蕴含的力量,可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推动力,也可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阻滞力。如果向深层追溯,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支配与文化对抗经常发生,造成的文化矛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众产生很大影响,“要理解为什么一个社会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为什么它是稳定的或纷乱的,就要求对处于不同社会集团中的人的当代心理构制有所认识。这反过来又需要对他们的性格是怎样在时代的所有结构性文化力量中形成这一点有所认识。”<sup>[13]</sup>在由意识形态控制造成的文化矛盾中,心理结构和文化信念是固结社会框架的“精神水泥”,道德或意识形态包含着使自身“社会化”和“文明化”的力量。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已经从原来的被压迫被剥削状态变成在形式上更民主更自由的状态,在这种政治文化氛围中,资产阶级似乎找到了使自己“长生不老”的精神秘方。资产阶级学者也不断地美化和粉饰这种物质生活和社会制度造就的文化形态,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渗透到社会之中形成的破坏力,因为在对社会大众实行精神控制的过程中,社会大众的反控制力量也在增长,当资产阶级把意识形态作为控制社会的思想工具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反抗也在积蓄能量。大众化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扩张引起了多样的变化趋势,一方面是显性的商业化形势,另一方面是隐匿的文化权威,后者经常引起文化对象的迁移。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变化不是西方学者所谓的文化上的“华丽转身”,只是在形式上实现了乾坤大挪移——文化工业成为具有标志意义的内容,它作为一种匿名权威把意识形态的实质隐匿起来。“它伪装成一般常识、科学、心理健康、正规性、公众舆论。它是心照不宣的,无须采取命令式。它不是一种粗暴的强迫而只是一种温和的说服。”<sup>[14]</sup>这种“匿名权威”抽掉了思想本质,在一些方面迎合了社会的心理需要,而在另一些方面成为社会暴力的工具。在匿名权威造成的文化氛围中,工人阶级已经找不到革命对象,他们即使要革命也不知道

要革谁的命。“人们对命令和命令的下达者都一团漆黑。就象一个人中了枪弹却不知道射击者是谁。于是,人们即使想还击也找不到还击的对象了。”<sup>[15]</sup>匿名权威用无形的文化之手操纵着资本主义的行为,以特定的方式维护着资本主义运行,“这种因素证明文化是使一个处处充满崩溃裂纹的社会勉强支撑下去的水泥骨架。”<sup>[16]</sup>资本主义通过意识形态总动员唤起的神秘力量,将无产阶级变成了一群操作机器的被动群体。匿名权威在文化语言上的支配尤其明显,经常用一套规定的话语方式体现格式化的思想内容,造成语言异化和思维方式的异化。

### (三)文化工业造成的社会消费张力

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对日常生活具有供应和调节作用,也对传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巩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在推动文化形态从“高雅”转向“世俗”的同时,还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控制中磨去了文化的棱角。外形精美的形态并没有给文化注入更多的魅力,而是以空前异化的形式深入社会之中,用于批量化复制和生产的文化工业,使文化产品也变得大众化了,逼真的复制与仿造让人们感到一切赝品皆有可能,这种行为助长了对知识产权和文化权利的伤害。工业文明被文化工业推向另一个高度,不仅成就了高雅文化的时代寄托,也扩展了伪劣文化的泛滥空间,马克思描述的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扩大一步,在这里有了真实的写照。文化工业是由大众需求表象之下的经济欲望驱动的,社会大众在心理意识上被动地接受文化工业的引导,文化工业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成为一种具有魔力的角色,其宰制作用渗透到每一个个体的生活中。这种普遍性的社会力量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引领作用,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借助消费文化、大众文化、流行文化,资本主义的商业内容也发生了复杂变化,消费激情、炫目广告、靓丽景观、流行梦幻、橱窗商品等,勾画出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百态,而金钱则成了寄托幻想、成就梦想、实现理想的通

货。文化工业制造现代消费方式的同时也催生出醉生梦死的群体,能否长期保持自身的魅力、激情和温度,关键要看产品的吸引力,由资本逻辑和消费理念交织成的旋律,构成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重要具象。在这样的变化中,文化工业以自己的特殊功能为资本主义发展鼓足了风力,资本主义航船正在驶向物欲横流的远方,人们虽然对于它的起航有一些认识和思想准备,但是对于它走向哪里、能走多远,还是有不少疑惑的。资本主义文化工业造就的巨大消费链,对社会的思想意识、制度设施、日常生活提出了新要求。资本的脚步一旦踏上这个台阶,就已经面临着文化生产的矛盾、消费市场的矛盾、消费群体的矛盾等,文化资本的链条以及文化生产的进程一旦断裂或中断,与此有关的文化矛盾也会因此被激化,那些看上去不相干的休闲文化、视听文化、娱乐文化,也会对主流文化提出质疑或抗议。这种文化矛盾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领域展开,已经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肌体之中,它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构成的压力也已经司空见惯。被复制的艺术作品经常引起人们的商业兴趣,而作为一种政治象征物,又经常引起决策者和学者们的遐想。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上的“偏食者”在欣赏他们钟爱的文化产品时,不免与那些文化上的“杂食者”产生认识冲突。这方面的矛盾在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尽管存在符合需要的表象,也仍然被那些不合理的表象所控制,它醉心于世俗追求而失去了艺术的超越性精神,并经常以程式化的方式限制语言的魅力。

### (四)日常生活造成的文化价值碰撞

探索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还可以从家庭、社会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资产阶级和各种个人主义对西方社会的影响,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它一方面维系着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另一方面也因为现代思维的植入而出现裂变。社会生活方式成为寄托文化喧嚣的重要形式,尤其是青少年,在文化行为中表现出极大的叛逆意识,并借助现代技术和艺术将文化的“先锋追求”展

示出来。以青少年为主体的新文化成为“文化市场”的主力,他们是文化产品的强大消费群体,在精神上经常接受现代文化的洗礼。就个性表达而言,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的“文化革命”,是一场以独特的个人行为打破人类与社会交织的传统纹理的革命,而在以前,这种社会纹理界定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组织形式,既包含着人类关系的一般形态,也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相互冲突的行为模式。这种颠覆旧的文化思维的现象,与其说来自个人的强力追求,不如说来自技术的推动。资本主义文化已经不甘心只在国内领域发生作用,它极力将影响推向世界各地,以日常交往为基础的文化矛盾被引向国际领域。在这种氛围中,不论新事物的裙角是否再度掠扫而去,都已经对文化矛盾构成一种外象上的影响,除了一些象征性内容和具有圣像色彩的意义之外,那些挥之即去的流行文化在不断地变换角色。日常生活中的风俗变化、休闲方式是文化矛盾的经常性因素,一方面是以平民化通俗化的方式维护传统,另一方面是以革新的名义主张废除传统,守旧与创新经常构成一对矛盾。“各种行为的解禁,社会规范的松弛,不但愈发推动种种此前被视为禁戒行为的实验和频率,也大大地增加了这些行为的曝光率。”<sup>[17]</sup>这种矛盾在对资本主义造成一定内耗的同时,也对现实社会提供一种启发。民俗文化、市井文化也会进入高雅文化之列,“百老汇”的音乐剧可以走进上流社会,爵士乐可以纳入民间,流行时装可以带上民俗元素,“桑巴舞”之中也有精英的追逐,官方生活方式也对民间文化产生影响,颂扬社会信仰与传播意识形态成了寄托文化意义的重要方式。不同的文化界面上积累着一种事实:价值重建与道德废弃共存、理性表达与意气用事共存、高雅文化与粗鄙内容并存,每一对矛盾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回避的问题,其最大影响在于颠覆了根深蒂固的社会惯例,那些经由社会规范、传统、禁令所表达的伦理关系,因新时代的文化矛盾而变换着自身形态。

#### 四、意象: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变化的内在逻辑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变化有其逻辑必然性,在一般性上,它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时性状态;在特殊性上,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共时性状态;在逻辑结论上,文化矛盾最终会为资本主义敲出一段丧钟,也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一段序曲,它从文化视角反映出“两个必然”的合理性。

(一)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变化提供了认识人类社会演进规律的新维度

新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文化及运行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信息技术推动了交往方式的深刻变革,造就了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包括文化悖论的社会状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不仅发挥了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也成了影响文化矛盾的决定性的因素,资本主义文化就在这样一个矛盾体系中运行着。就其变化规律看,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既提出了超前性的社会问题,也提出了悖论性的理论问题,既深刻地影响着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行,又是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重要诱因。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不能抱着观望心态而坐等其自行灭亡,要科学分析它对社会主义策略的影响,认识这一变化中的共性问题 and 个性特色,揭示人类文化运行的机理和机制。资本主义文化变化中包含为维护本阶级利益而作出的调整,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取向的调节,但要将这种变化描述成资本主义的新生,甚至描绘成马克思主义的失效,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自从社会主义产生以来,它与资本主义就是一对难解难分的冤家,文化思想上的差别总是困扰着持有不同政见的人们,文化色调难以调和的原因不仅有制度之别,也有价值观念之别,当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严重的文化矛盾时,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不对它作出合理的审视。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处的体系中,其思想文化都不是在孤立的范围内发生作用的,两种文化既有划定的边界又有跨越边界的交流,文化上的共处与竞争,使得资本主义文化矛



盾也对社会主义文化产生影响。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其文化内容中包含着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如果将之统统视为垃圾,不符合辩证法,如果将之全盘接受,也不符合辩证法。面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有必要认真分析其变化动因和根源,科学把握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与时代潮流的关系,认识这种矛盾在多大程度上是适应时代变迁的结果,多大程度上是固守社会传统的结果。从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看,追赶潮流是文化保持生命力的前提,如果它不想走向灭亡或不想在人类文化序列中消失,就必须主动顺应新变化、适应新形势、走出新路子。今天,我们认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要放在人类社会的大视野中来衡量,放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中衡量,放在促进人的解放的远大目标中衡量。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问题的深层反映,既培养了具有新型社会意识的群体,又锻炼了一大批具有进取精神的群体,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实践提供了新契机。

## (二)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包含着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新形式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折射出社会的内在张力,显性的革命因素被隐匿在社会之中,但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意志的消逝和阶级力量的消失,它以新的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延伸着,资本主义社会这只“满载愚人的船只或许会有一段时间顺风而行,但是它在向着命运驶去,这正是因为愚人们不相信这一点”。<sup>[18]</sup>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包含着新型的自我扬弃的因素,但没有消除社会革命赖以产生的根基,它给广大群众提供了锻炼自身能力的环境。在工人阶级中加强教育,经常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激励他们,是应对资本主义文化变化的重要思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方式的论述,对于认识当今时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变化仍然具有方法论意义。马克思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演说中指出:“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

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sup>[19]</sup>这是根据实际情况变化提出的革命策略的转变思路。恩格斯曾经根据当时资本主义变化提出了国际工人运动“共同的行动计划”思想,认为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国际工人运动中“再也没有宗派了,再也没有人标榜教条主义的正统性和教条的至高无上了,只有共同的行动计划”,这是对第一国际革命精神的彰显,也为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行动提供了思想启示。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变化中,工人阶级的概念和成分都有了新内容,如果再把革命文化主体完全等同于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把革命力量完全等同于无产阶级力量,如果不切实际地要求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不断革命”,要求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方面都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显然有悖于社会现实。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社会性表明,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能力是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出来的,他们离“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立一个新世界”的要求还有距离,建立新的革命阶级体系,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变化提出的又一新要求。在范围上扩大了无产阶级队伍,尽管对革命的态度不像以往那样“充满了否定性”,但绝对不是变成了“资产阶级化”了的力量,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载体、媒介、方法都需要重新审定。资本主义极力强调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在这种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捆绑的体系中,否定性的文化力量已深入社会肌体,“其结果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可怕的矛盾之中,一方面,生产力的增长使人们可以通过产品的自动化而在世界上享受——这是绝对新的东西,但同时,现实‘目前’却变得越来越可怕。”<sup>[20]</sup>因此,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包含着不断增长的否定因素,其力量变化和矛盾状况刻画了自我否定的轨迹,这也是规划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重要参考。

(三)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新变化提出了理解未来社会发展的新思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最明确的理论主张是“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前者是谈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总体规律，后者是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面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消极适应或强硬拒绝都不是客观的态度，积极应对资本主义新变化和社会主义新情况，是时代和社会变迁提出的新要求。一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文化话语重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革命话语，不能仅仅定格在起义、暴动、斗争等的宣传上，要紧跟时代潮流作出现实回应。话语对象不能局限于处在具体劳动之中的工人，要把从事知识和技术开发等方面的工人也纳入其中，不能局限于狭小的文化叙事，要用宏大叙事表达社会主义长远目标，不仅要揭露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性，还要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性。二是增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软实力和提升文化自信。资本主义文化构造了一个充满矛盾的现实共同体，尽管既平庸又陈腐，却给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民众以“虚假的满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作为独特领域的客观存在，也以自己的运行轨迹影响着人类社会，社会主义要想消除资本主义的影响，必须拥有自己的文化信心。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只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而不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是没有意义的，要在文化建设中不断提升自信和自觉。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不是口头上讲出来的，“两个必然”要求我们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而“两个决不会”又要求我们踏踏实实地积蓄力量。丹尼尔·贝尔曾武断地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文化思想，没有说明经济基础到底如何催生出不同的文化模式，并断言阶级文化毫无意义，这种釜底抽薪式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做法，从小处看是抹杀了“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的界限，从大处看是模糊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两种状态都模糊了文化边界。三是在日常生活中积蓄

革命力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日常文化、日常审美都商品化了，全世界的乡村和城市的日常生活都变得商品化了，马克思恩格斯描述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sup>[21]</sup>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进一步确证，而且进一步引起了连锁反应，“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sup>[22]</sup>这种现象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继续延伸和扩大着。日常生活中隐含着革命精神和美好憧憬，资本主义社会对日常生活垄断并不能完全改变整个社会拘谨而又开放的矛盾心理，也不能僵化地理解为社会主义思想的缺场。与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相比，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具有更多的自由空间，生活更加多样化，语言更加灵活化，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也不能被忽视。

(四)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变化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要求

资本主义文化的“变”与“不变”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变”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常态，“不变”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稳态，“变”与“不变”都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它在时间上既要永恒又要当下，因而是虚幻的；它在空间上既要存在又要终结，因而是错位的。现实被归结为纯粹的数字，数字又引人走向虚拟，这种既有乌托邦特征又有俗世色彩的文化正预示着一场新的风暴。不能简单地把共产主义社会等同于单纯的物质生活，马克思提出的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要奠定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物质基础。但是，精神品质的提升是共产主义社会应有之义，通过提升社会的文化质量来解决文化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使命。也不能把共产主义文化完全等同于单纯的政治文化，建立了先进的体制只是确立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制度基础，思想准备和灵魂塑造是更艰巨的任务。从资

本主义文化矛盾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理性,在求同存异思维下寻找人类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体现不同文化交流和互鉴的胸怀和气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之变为我们提供了社会主义文化策略之变的重要依据,社会主义文化也要应时而变,包括:1. 应时代之变而变。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演变中有不同的时代印记,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计算机时代、数字化时代等都代表了一定的文化状态和文明程度。社会主义革命或建设的策略也是应时而变的,深入理解时代之间、时代之困、时代之需,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前提。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sup>[23]</sup>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不能辜负这个时代,就文化建设而言,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任务是如何在坚定文化自信中走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面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及其对外推行的文化霸权,社会主义文化不能只停留在被动的防御状态,在思想上“蜗居一隅”更不可取,这个时候更要发挥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并在竞争与比较中战胜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sup>[24]</sup>

2. 应技术之变而变。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演变与现代科技有很大关系,它扩展了文化的影响范围、影响速度和影响程度,使文化在时空上有了更大的动能和势能。全媒体时代的文化建设离不开多种技术的融合创新,不仅要克服“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的技术隔离状态,也要克服“鸡对鸭讲”“对牛弹琴”的对象错位状态,还要克服“关公战秦琼”的时代错位状态,这一切都要求充分发挥现代技术的作用。

3. 应社会之变而变。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千年不变的神话,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也不

是固定不变的格式。马克思主义是在物质和精神的关联中理解社会发展的,“经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巩固住我们的政权。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sup>[25]</sup>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是综合国力方面的事情,而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事情,作为体现国家力量的重要因素,文化软实力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力量,也是体现世界社会主义内蕴的重要力量。

#### 注释:

[1][5][17][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郑明萱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14、404、412页。

[2][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4—515、568、9页。

[6][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页。

[8][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智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4页。

[9][11][12]张一兵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下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459、468页。

[10]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43.

[13][16][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51—52、92页。

[14][15][美]弗洛姆:《逃避自由》,陈学明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年,第222、22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9页。

[20][法]列斐伏尔:《资本主义的幸存》,伦敦出版社,1976年,第104页。

[21][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403页。

[2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

[24][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4页。

[责任编辑:刘姝媛]